

论政治权威导向的新民歌运动特征

方 涛

(海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海南 海口 571158)

摘要: 1958年的民歌运动, 是一场浪漫主义的文学运动, 更是一场文学的“大跃进”, 它积极应和当时甚嚣尘上的政治“大跃进”和经济“大跃进”, 致使整个社会充溢着一种浪漫浮躁的诗情。它是政治权威话语的产物, 其发生的原因与外部的权威导向密切相关。其创作者的民间身份(立场)显然被质疑并被消解。新民歌运动的形成其实就是集体主义膨胀的一个文学结果。

关键词: 权威; 新民歌; 浮躁

中图分类号: I27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743(2009)01-0023-04

开始于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 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收集整理民歌, 而是对建国后确立的文学大众化方向的进一步确认强化; 新民歌运动并非真正意义上民间自发创作的民歌潮, 其本质是权威话语借用群众创作运动方式来建构统一民族文化认同的试验。从文学视点看, 它是一场浪漫主义的文学运动; 从文化视点看, 它更像一场热闹非凡的政治性群众文化运动。它迎合亦激化了当时国内“超英赶美”的政治情绪, 人们达成“超英赶美”的目标不是靠夯实现实的基础和借用现代化的方式, 而完全依赖于浪漫主义的激情和幻想。全民性民歌运动恰好被选择用作宣泄这一浪漫激情的最佳形式。同时它也可填补由于反右斗争而留下的文学艺术荒芜的空间, 民间创作成为修复文学断层的重要资源。尤为重要的是这一场文学诗歌的“大跃进”, 积极应和了当时甚嚣尘上的政治“大跃进”和经济“大跃进”, 它深受文化冲动时代潮流的驱策, 同时更以其充沛的浪漫浮躁诗情去强化社会文化冲动的情绪。

一 新民歌运动首先是政治权威作用的产物

它的发生与1958年前后在工农业生产及其

它领域进行的“大跃进”运动有关, 它是为适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建设的需要而发动的, 其发生的原因与外部权威导向密切相关。新民歌以其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文化, 是“共产主义文学的萌芽”而被视作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 成为新时代民族文化认同感最广泛的理想代表。可以说, 对民歌的选择重视具有明显的政治动机。政治权威运用其得心应手的唯意志论和群众运动的发展模式去达成目的。这种中国特色屡试不爽的发展模式与新民歌运动的文化民族性诉求之间存在必然的姻缘关系, 其共同点在于浪漫而激情, 即所谓“革命浪漫主义”。

1958年3月22日,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讲话中提出要注意搜集民歌。于是,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的社论, 并大量刊载民歌作品; 中国文联, 中国作协等单位立即进行“采风大军总动员”; 各省党委或宣传部相继发出了关于组织收集民歌的通知; 全国各地成立采风组织和编选机构; 各地报刊纷纷开辟民歌专栏。由此, 自上而下地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民歌运动。新民歌运动引人关注之

处在于：其一，权威话语影响，参与人群甚众、参与热情高涨，由于毛泽东的权威地位影响，这运动迅速生成并有组织有领导地全面开展。其二，新民歌创作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组织领导高度重视诗歌的产量，各级都要定计划发指标分任务，像完成钢铁产量和粮食征购任务一样完成民歌创作任务。“到处成了诗海，中国成了诗的国家”，有的地方还提出了“村村要有李有才”，“县要有郭沫若”，致使中国可称为作家的人数激增近两百倍。安徽一个县半年创作民歌 51 万首。这场民歌运动显然不是那种“感于哀乐”的自然抒唱，而是政治集权倡导与推动下的伪民歌运动，从根本上违背了民歌产生的内在规律（即自发性生产），结果是如此大张旗鼓地以运动的方式倡导民歌却并未促进民歌式诗歌的真正繁荣，仅仅盛产了一批矫饰虚夸的浪漫主义的伪民歌。

周作人在《中国民歌的价值》中说过“民歌的特质，并不偏重在有精彩的技巧与思想，只要能真实表现民间的心情，便是纯粹的民歌”。所以，真正的民间诗歌都是有感于人们在生活与劳动中的喜怒哀乐而发的，“动乎天机，不费雕琢”，只管应和自己的内心的情感，任意而发，自然天成。正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他们在田野大风中劳作，感叹社会的不公，生活的艰辛，怨刺上政，自由地抒唱内心的愤懑与爱恨，不矫饰生活，亦不伪装感情。“心之忧矣，我歌且谣”（《魏风·园有桃》）。民歌是对内心忧戚的自由抒发。意犹未尽时，便重章叠唱，一唱三叹，却歪打正着地加深了民歌的情感浓度。正因为如此，过去的许多王朝都有“观风”的传统，设立乐府考察民间诗乐，了解社会风俗之盛衰，“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① 所以十五国风在真实反映西周东周五百年的社会现实上较之其它典籍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这个角度来说，新民歌运动从根本上违背了民歌所具有的民间精神，所谓民间精神即深厚的人民性，深蕴其中的是现实性、批判性以及乐观精神和自由精神，由此构成了民间精神的传统。因为，我们在此并未看到可说是与民歌与生俱来的伟大而自由的精神，却遍布障碍、禁忌与不宽容，令创作者不能伸张自己的生命体验与感

悟，只能在一个被政治允许和预设的领域里编织文学的经纬，真实生活的沉重、复杂被提纯净化了，民间自由的精神传统亦被彻底消解。

二 新民歌创作者的民间身份（立场）颇受质疑

按周作人对民歌的界说：“是生于民间，并且通行民间，用以表现情绪或抒写事实的歌谣”。 “民间这意义，本是指多数不文的民众，民歌中的情绪与事实，也便是这民众所感的情绪和所知的事实”。^②

“新民歌”的作者构成以文化人为主，从根儿上就缺乏他们所代言的民间精神和底层意识。他们创作新民歌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他们对延安整风运动以来的所有文艺运动的经验记忆和历时弥久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功利理性，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士）不可超越的历史宿命。“士”从一产生就是一个尴尬的依附阶层，从古至今，他们都必须受约束并依附于政治集团权力中心（过去是皇权）才能有所作为（如孔子周游列国的行为）。20世纪初科举的终结似乎为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提供了现实的可能，但历史宿命的阴影并未彻底消散，精神上的独立尚远未能实现。因为在他们的历史记忆中，所有与政治集权对抗的人，最终都被剥夺得很彻底，直至生命（如王实味、胡风）。而一向主导其精神、意志与行为的功利理性亦会使他们在权衡利害之后迅速转向，认同集权的政治理念，进而以民间代言的身份投入创作，推波助澜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民歌运动，这种同类集体转向所形成的对个人影响力和压迫感并不亚于来自集权政治的钳制力量。在这里还需要我们认真辨析的是：民间的意义就在于体现了真正的民众立场和草根性，在精神上与大地的天然联系，散发出来的是居“庙堂”之外，处江湖之远的自足自乐的气息和单纯的生命诉求；民间精神与主流意识形态疏离，无功利性。

“新民歌”作者构成中的工农兵作者群身处时代变革之中，因为主体地位的提升而导致人格膨胀，因为有了主人公意识而认同接受了权力意志所赋予的有色眼镜而去乐观浪漫地感受生活，反映生活，畅抒浪漫激情。其创作动机来自于现

^①《汉书·艺文志》商务印书馆 1955 年版

^②周作人《中国民歌的价值》1919年，周作人为刘半农搜集注释的二十首《江阴船歌》作序，后以《中国民歌的价值》为题发表于1923年《歌谣》周刊第 6 号。文中借用英人 Frank Kidson 在《英国民歌论》第一章中的理论，为民歌（Volkslied Folksong）作界说为“是生于民间，并且通行民间，用以表现情绪或抒写事实的歌谣”。

实生存的政治作用，其创作视角受外力制约，其描写的生活多是超越现阶段生活的幻想图景，所抒发的诗情也表现出太多理性追求特征。由于身份的变化，立场的转移，其最终以与集权政治的合谋而彻底消解了民间天籁本真的意义。

三 集体主义的膨胀与个人的消解

新民歌运动的形成其实也是集体主义膨胀的一个文学结果。在中国，集体主义曾有过十分辉煌的历史。从儒家群体主义思想数千年的迁延，发展到 20世纪对马克思主义集体主义价值理念的自觉选择，就说明这一价值理念的强大功效以及在中国甚至是在整个人类社会都存在着广泛而坚定的文化与心理的基础。尽管其负面效应也是那么显而易见，即：它总是把集体与个人对立起来之后将集体的价值准则推向了极致，要求个人服从于一个统一的集体价值理念。

一般来说，在一个相对专制封闭的社会形态里，集体主义经常容易成为人们乐于接受的价值观念，因为人们只要泯灭自己融入集体就能在那里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每个人只要忠实地自己在社会秩序中所扮演的角色，作为回报，在受到秩序约束的同时也就获得了一种归属感，成为秩序（集体）的确定部分，于是，秩序也便可以自己的力量强化着个人的力量使其显得底气十足，继而从中获得优越的快感而不必遭受孤独感与无助感的煎熬。

如若把此种模式放之于动物世界之中，集体主义给予其成员的巨大益处则变得愈发清晰，生存的意义越发凸显。在动物世界里，以一个或多个个体诱发的某种行为模式最终成为众多同类为了相同目标共同行动的群体特征，这对于动物来说，实在是一个太过于复杂的行为模式。但是，人们却惊异地发现：在自然界，集体主义的牛、集体主义的羊、集体主义的鱼的确是一种普遍的存在，这种现象曾令生物学家们大惑不解。实际上答案极为简单，在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里，掠食者面对群体的猎物时常常无法聚焦于一个猎物而显得犹豫不决，即使是极为凶猛的狮子也只能耐心地等待某只因体弱而不能以同样的速度朝着同样的方向奔跑的羚羊从集体中脱离。因而，集体主义对于一个弱者来说不失为一种特殊的保护策略，这才使我们人类有幸看到了一些弱势群体在异常凶猛的敌人面前英勇的穿梭与奔跑的壮观场面。

奥地利的生物学家康罗·洛伦兹的研究结果给予人类的启迪决不仅仅如此，更深邃之处则在于这个集体愈庞大，对于个体的吸引力也就愈大，个体离群的行为也就愈少愈艰难，那么，由此而派生的群体的盲从性也就愈大。由这幅鲜活生动的自然图景中抽离出的结论不得不令人警醒，集体主义理念是一把双刃剑，它所引发的集体主义的行为既可聚合起个体的力量而使其变得孔武有力，所向无敌，成为特定时期凝聚民心民力的必胜法宝，又可使个体萌生出极其强烈的功利理性和盲从冲动，为专制统治提供生长的温床。

新民歌的创作者正是在这种强烈的功利理性和盲从冲动支配下把最自由的民歌变成了集权理念的传声筒，在集体主义的膨胀中彻底泯灭了自我。虽属个人创作却取消了爱情，消解了“怨刺上政”而众口一词地转向了对集权认可的公共情感的宣泄——即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望与激情的宣泄。诸如在《人定胜天》中的表达：“天冷冷不了热心，地冻冻不了决心，冰雪盖不住信心，狂风吹不倒恒心。我们说：人定胜天，劳动的人是万能。”导致其题材的局促、狭隘和单一。真正民歌（珍品）的形成都是集体创作的结果，但它却是最个人化的表达，正如周作人所说：民歌“无非经少数人拈出，大家鉴定颁行罢了”。无非是个人化的感悟与经验成功传递出了触动人们共通心弦的普遍情感。民歌的题材其实也挺单纯，不外乎是抒唱民间疾苦或是性爱的表达，虽简单却囊括了最基本也是最强烈的人性欲望。正所谓“食，色，性也”。借此使得个人在集体创作和传播流程中未被消解反而获得了极度张扬。而在新民歌中我们看到的情形却恰好相反——在集体主义的认同中迷失了自我，著名的《我来了》中虽然以“我”的名义在抒情，但个人的色彩已消失殆尽，如此孔武有力的“我”已被置换成了集体的代名词：“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路——我来了！”在这整齐有力的众声合唱里不协调的声音是极其微弱的（何其芳的“民歌体，有限制”）。在个人缺失的同时还流失的有新民歌的艺术生命力，仅把自己定格到 1958年的那个逼仄的特定时空里，成为了一个历史的遗迹。

四 浪漫主义的膨胀与现实性的解构。

民歌是浪漫与现实完美结合的产物，它深蕴

其中的现实性是显而易见的，若听一听这桑间陌上的不平之声，街头巷里的怨愤之语，你就会与一位诗人的思想产生共鸣：“他把带泪的悲歌，放到乐府的天平上，让所有的谄笑者，都失去了重量。”所以直到今天，国风与汉唐的叙事诗仍是我们倾听那个时代的重要声音。而新民歌消解了民歌与生俱来的现实性、批判性，使其成为与“庙堂”政治合谋的产物。

1958年的中国到处充满诗意，思想极度解放的大跃进的诗篇、黑板报，诗传单在全国城乡比比皆是，诗意成为全国干部群众的生活精神，整个民族就像喝了清醇的美酒，飘飘欲仙，一切条条框框限制束缚统统被打破，“敢想”、“敢说”“敢干”成为时尚行为准则，豪言壮语充满神州大地。“如今歌唱用箩装，千箩万箩堆满仓。别看都是口头语，搬到田里变米粮”。这是人们对经济大跃进和民歌文化创造之间联系的认识和形象表达。人的思维远远超出了现实生活，上天入地，穿梭古今，跨越中外，憧憬美好未来，可以尽情想象。描绘的共产主义理想境界与传统文化里的民间神话、传说故事、民间戏曲中的人物及其文化性格，都在1958年的中国大地现时态中展现。想象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种种物质形态都汇入那时中国人的精神境界之中，成为其现实生命的精神血液。毛泽东称之为：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

新民歌虽继承了民歌的浪漫主义外部特征，

但却从根儿上违背了浪漫主义的本质。浪漫主义是文学中的自由主义（雨果语），罗素也说：浪漫主义运动从本质上讲，目的在于把人的人格从生活习俗和生活道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这一点上，中西方都是如此。中国的老庄思想就是浪漫主义的哲学基础，其天马行空般自由不羁的思想代表了那个时代人们想要冲破现实的束缚、主观地把握世界、超越现实的强烈愿望，其最大的功绩就是把人从社会习俗和社会道德中解放出来，把自我的自由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民歌的中心思想专在恋爱”（周作人语）其实就是在浪漫抒情中企图达到对现实道德束缚的主观超越。而且在意犹未尽时，便重章叠唱，一唱三叹，歪打正着地加深了民歌的情感浓度。从这个角度来说，新民歌的浪漫主义激情不能说没有一点现实基础，它确实是整个社会对未来美好生活憧憬的文学表现，但是如若现实伪了，一切都伪了。

“超英赶美”在当时是一个被极具诗人浪漫气质的毛泽东虚构出来的社会目标，匮乏最起码的实现基础，那么横亘在现实与目标之间的巨大裂痕最终只好由主观浪漫的想象来填充：“如今唱歌用箩装，千箩万箩堆满仓。别看都是口头语，搬到田里变米粮”；“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浪漫夸张的手法虽一脉相承，但内在情感的真实性已被彻底颠覆，致使新民歌运动最终成为了一场彻头彻尾的伪民歌运动。

参考文献：

- [1] 鲍焕然. 新民歌运动：激进现代性的文化表征 [J].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7(5).
- [2] 江波. “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运动”[J]. 党史纵览, 2007(5).
- [3] 谢保杰. 1958年新民歌运动的历史描述 [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5(1).
- [4] 史竞男. 喧嚣躁动下的寂寥：关于“新民歌运动”[J]. 山东社会科学, 2004(8).
- [5] 刘延年. 毛泽东与新民歌运动 [J]. 江淮文史, 2002(2).
- [6] 张桃洲. 论“新民歌运动”的现代来源——关于新诗发展的一个症结性难题 [J]. 社会科学研究, 2001(4).
- [7] 高有鹏, 孟芳. 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的民间文化思潮 [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4).
- [8] 潘旭澜. 新民歌简论 [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60(7).

(责任编辑：张玉秀)